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区域开发合作

王 胜¹, 黄丹英²

(1.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海口 570204 2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口 570228)

摘要: 从海洋环境、海上航运、海上能源和海洋食品等方面分析了南海地区凸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 学术界开始对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关注, 但直到 21 世纪, 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 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与区域开发合作才真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领域。南海地区非传统海上安全威胁主要源于: 周边沿岸国家的海洋污染, 猖獗的海盗行为, 能源安全利益竞争以及过度的海洋捕捞。呼吁南海周边有关国家通过双边和区域开发合作方式, 进一步增强南海地区各国人民在海洋环境、航运、能源和食品等方面的安全意识。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区域开发; 合作; 南海

中图分类号: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08)02-0025-05

1 引言

几大主要因素使南海地区成为研究非传统安全和海上区域开发合作的典型区域。南海在周边国家的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品、能源和就业机会。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海上通道之一。由于海上航运繁忙以及周边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 该区域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更为重要的是, 周边国家面临众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 跨国犯罪(海盗、走私和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海洋生态破坏和海洋资源争夺等。“9·11”后, 非传统安全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见诸于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研究议程、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等。近几年, 非传统安全在南海的区域合作也初现端倪。文章力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利益角逐的视角, 剖析“9·11”恐怖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南海的区域开发与合作, 为南海周边国家的研究机构、学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参考。

2 “9·11”事件后的南海局势

21 世纪, 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非传统安全问题, 如恐怖袭击和公共卫生安全等, 逐渐升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1]。例如, 2001 年, 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 2002 年, 发生在印尼巴厘岛的恐怖爆炸案件; 2003 年, 发生在中国和一些国家的“非典”事件; 2004 年, 印度洋海啸和俄罗斯的别斯兰事件; 2005 年, 伦敦地铁爆炸案等。“9·11”后, 恐怖主义成为美国乃至

全球安全的头号敌人, “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 世界大国关系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调整, 恐怖主义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公敌。相应地, 南海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2.1 南海安全问题重心的转移

“9·11”恐怖事件后, 国家安全问题更多地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南海周边国家逐渐把国家安全的重心放在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打击海盗、走私和跨国犯罪以及控制禽流感蔓延等相关的合作事宜上来。

2001 年 10 月, 在上海举办的第九届 APEC 峰会上,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新闻界宣读了上海 APEC《领导人宣言》。宣言声称恐怖主义破坏了“每一个民族、每一种信仰和每一个国家的和平、繁荣与安全”, 并承诺“要加强在联合国和 APEC 等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以减少恐怖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001 年 11 月, 在第七届东盟峰会上, 东盟国家领导人把“9·11”恐怖主义袭击看作是对东盟和平、进步和繁荣的直接挑战。

2002 年 1 月, 东盟各国外长在北京共同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表达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决心。5 月, 东盟部长级会议就恐怖主义问题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东盟各国部长负责管理跨国犯罪, 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 特别是所有相关的联合国决议, 预防和遏制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2003 年 10 月, 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 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 在跨国问题上积极开展合作, 开辟了安全合作的新领域。

2004 年 1 月, 中国与东盟在泰国曼谷签署《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确定了双方反

收稿日期: 2007-10-14 修回日期: 2008-01-20

作者简介: 王胜(1961-), 男, 福建福清市人, 硕士, 主要从事全球化、非传统安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研究, (E-mail) wangsheng@faohn.gov.cn

恐、禁毒和打击国际经济犯罪等重点合作领域,明确了各领域的中长期目标,规定双方将通过信息交流、人员交流与培训、执法协作和共同研究等方式加强合作。

与往年相比,2005年,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传递性和普遍性更显突出。南亚、东南亚成为恐怖袭击重灾区,印度、印尼等国都受到大规模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地震、飓风等其他非传统威胁也在上升。南亚大地震使印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禽流感、登革热等传染病在越南、泰国等国爆发。上述非传统安全威胁促使南海周边国家逐渐加大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力度。

2006年10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包括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等,双方还同意继续在次区域、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磋商。

2.2 南海地区政治安全结构的变化

南海地区主要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¹包括东盟、中国、美国、日本等。“9·11”事件后,南海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2.2.1 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开始对话进程关系,双方经历了消除疑虑、对话伙伴、睦邻互信、战略伙伴等发展阶段。尤其是“9·11”事件后,东盟与中国积极拓宽和加强双边关系。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办的第八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会谈中,双方还签署了3个重要文件:《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3年,中国正式同意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该条约的首个区域外大国。目前,中国与东盟间的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以及科技联委会共同构建了中国—东盟五大平行对话合作机制。未来的10年,中国与东盟将致力于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卫生、信息通讯、交通、发展援助、湄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等签署协议。

2.2.2 美国强化与东盟盟国的反恐军演。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服从并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9·11”事件后,美国加强同南海周边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特别是与盟国间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成为美国南海政策的主旋律。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等东盟成员国成为美国在南海地区亲密的安全合作伙伴,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明显增加。例如,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9·11”事件后,阿罗约政府邀请美军重返菲律宾,协助训练和装备菲律宾军队。2002年,美国

与菲律宾签署了“后勤支援互助协定”,协定允许双方以现金或是等价物资交换的方式互相提供后勤支援。再如,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在泰国已经开展了20多年,每年举行一次。从2002年起,新加坡正式加入,越南、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派观察员参加。2003年,“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的范围扩大到了泰国南部,18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联合军演地成了多国反恐合作的演练场。

2.2.3 日本美化其军事力量在南海存在的合法性。2001年10月,日本以最快速度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派军舰到印度洋支持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突破了二战后日本向海外输出军事力量的禁忌。2003年6月,日本参议院以202票对3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和《自卫队法修改案》。所谓“有事”,是指日本认为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有事”不光包括战争,还包括恐怖行动、劫持绑架等“所有威胁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态”。随着“有事三法案”的通过,允许日本自卫队对活动的区域由日本的本岛扩展到包括南海在内的“周边地区”。2007年1月9日,日本政府把“防卫省”的牌子挂到原防卫厅的大门口。从此,1954年成立的日本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政府最近还声称,在紧急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在日本以外的区域执行任务。近年来,日本已大幅度地强化了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其军事力量借“反恐”的名义已渗透到南海地区。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使原本就复杂的南海局势更趋复杂化。

2.2.4 印度军事存在从印度洋向南海扩张。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实施了南扩战略。2001年10月,印度派遣一支由6艘军舰组成的编队在南海与越南、日本、韩国等国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此后,印度海军编队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留在南海海域,与前来的印度海军“基

¹ “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由来: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演说中先后7次使用“stakeholder”这个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引起两国政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后来,“stakeholder”这个词被众多人士进一步详加讨论,成为刻画2005年中美关系的新关键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部主任兰普顿认为,在中文中没有能与“stakeholder”相对应的词汇,在美国,这个词意味着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利益和责任,“stakeholder”的含义与“partner”(伙伴)相接近。“stakeholder”这一词,在中国并不常用,国内有多种不同的翻译,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研究员曾撰文将该词译为“共同经营者”;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将该词译为“利益相关者”;因在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较为普遍地使用“利益攸关方”这一术语,因而作者在文章中也使用学术界通用的术语“利益攸关方”。

洛”级潜艇和反潜巡逻机会合,举行单方的海上军事演习,标志印度军事力量在历史上首次介入了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

2.2.5 俄罗斯在南海影响力的萎缩。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主要财产继承者俄罗斯接管了越南的金兰湾军事基地¹。由于无力交付租金(每年 3 亿美元),2002 年 5 月,俄罗斯与越南签署了提前移交基地的协定。2004 年,俄罗斯军队撤出金兰湾。俄罗斯在南海地区影响力也随之急剧下降。

3 南海局势变化的原因分析

“9·11”事件后,南海局势的新变化是由多种原因综合促成的: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其局势变化的必要性因素,是根本原因;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忙于“反恐”战争,其主要精力耗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而南海“利益攸关方”的实力此消彼长,这为有关国家参与南海利益角逐提供了可能性,是南海局势变化的重要原因;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危害性使南海“利益攸关方”之间相互借重面增大,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妥善解决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唯有通过合作才能打击、遏制和消除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是南海新一轮利益角逐在表面和解的氛围下悄然进行的根本原因。

3.1 南海概况

南海是一个半闭海,包括 200 多个岛礁,北至台湾海峡,南抵新加坡,涵盖了 300 多万 km² 的海域。近年来,南海备受世人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岛礁及其周围海域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以及南海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

3.1.1 丰富的自然资源。南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南海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国专家估计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俄罗斯的《外国地理研究》(1995)认为,南沙群岛储藏有大约 60 亿桶石油,其中 70% 可能是天然气。克拉尔在其著作《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标地》(2002)中,把南海看作是太平洋西部链条上战略三角的第三点,这是因为南海储藏有巨大的油气资源。除了油气资源外,南海还蕴含着丰富的深海资源,例如,研究人员罗列的动植物物种就有 8600 多种,包括牡蛎、金枪鱼、各种海洋多毛虫和深海植物。事实上,沿岸国家人口摄入的蛋白质有一半以上来自于南海。

3.1.2 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南海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海上通道之一。世界上大约 25% 的海上运输途经南海,逾 50% 的世界超级货轮经过这片水域。途经南海西南端马六甲海峡的油轮数量是苏伊士运河

的 4 倍,巴拿马运河的 6 倍多。南海也是有关国家军舰由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极为重要的通道。

3.2 南海的“利益攸关方”

“9·11”事件是南海新一轮局势变化的契机性事件。美国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南海周边国家也逐渐把国家安全的重心放在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打击海盗、走私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因而,形成了南海的“核心利益攸关方”、“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和“非核心利益攸关方”这一新的格局。

3.2.1 东盟。在东盟 10 个成员国中,有 8 个国家濒临南海,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因而被统称为南海的“利益攸关方”,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中国(包括台湾省)等六国,被认为是南海的“核心利益攸关方”(controlled SCS stakeholders),因为上述六国在南沙群岛存在领土争议。而柬埔寨、泰国和新加坡没有卷入南沙群岛的领土纠纷,但作为东盟成员国,乐于促进南海问题的解决。因此,这 3 个国家被认为是南海的“非核心利益攸关方”(appreciated SCS stakeholders)。

东盟成员国以所谓“东盟方式”(ASEAN Way)²来处理其内部的利益纷争,包括南海纠纷。目前,“东盟方式”对于亚洲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东亚地区的合作以“10+3”(东盟加中日韩三国)、“10+1”(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以及“东亚峰会”(东亚 13 个国家、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层框架推进,这些都是由东盟倡导和领导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框架下已开辟了 17 个合作领域,建立了 13 个部长级合作机制。

3.2.2 中国。中国被认为是南海的“核心利益攸关方”

¹ 金兰湾军事基地是位于越南东南部海岸金兰湾,南北都有陆地包围,港湾水深可停泊航空母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它同时位于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争期间,南越政府将金兰湾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美国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扩建,在战争中使用该基地出动飞机对北越地区进行轰炸。越战结束后,美军被迫撤离该基地。1979 年 5 月,苏联同越南签订协议,租用金兰湾 25 年,用于控制东南亚地区和其沿海一带。80 年代,苏联进一步对金兰湾进行了扩建,使其成为苏联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2004 年,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力交付租金(每年 3 亿美元),其撤出金兰湾。之后,美国对该军事基地又产生兴趣,有意租用。

² “东盟方式”(ASEAN Way):2006 年 8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张蕴岭所长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东盟摸索出了一个适合东南亚国情的方式,即“东盟方式”。“东盟方式”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地区合作框架下,通过协商,制定合作进程和目标。东盟创建了一个宽松的、能够吸纳地区各国的合作框架。这个框架起到了 3 个重要作用:一是把所有的国家逐步纳入到一个地区合作机制之中,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联合整体;二是通过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实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更高层次的联合;三是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本地区各种矛盾,使东南亚由一个冲突不断的地区变为一个密切合作的地区。东盟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所采取的是“软性方法”,与欧盟的“制度性方法”有很大不同,东盟的合作进程并不靠立法,其决议对成员国也没有约束性。

(controlled SCS stakeholder)。就南海问题而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南海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中国维护南沙群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根据国际法和该地区所享有的通行自由。事实上,中国过去从未干涉过外国船舶和飞机在此地区的通行自由,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愿同南海沿岸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国际航道安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政府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愿意在争议解决前,同有关国家暂时搁置争议,开展合作。中国政府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2000年12月25日,中国与越南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该协定已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这是中国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海上界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示范作用。再如,南海多边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果。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办的第八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的行动。该《宣言》的签署不但缓解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还促进了双方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海上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3.2.3 美国。美国在南海也有着至关重要的航运安全利益。美国被认为是南海“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influenceable SCS stakeholder)。美国对南海一直给予高度的关注,因为南海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它不仅有利于美国舰队的转场,同时也有利于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和对其盟国的保护。南海的航线是美国从波斯湾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通道。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和日本缔结了保证日本安全的条约,相应地,美国对保护日本极为重要的航运路线具有义务。此外,尽管美国和菲律宾订立的同盟条约中并没有承认南沙群岛为菲律宾的领土,但是根据条约美国对菲律宾具有协防的义务。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关注南海形势的发展。1995年5月,美国对南沙群岛争端发表了第一个正式的公开声明,声称“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随后,美国逐步增强其在南海的影响。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份新的《部队访问协定》,允许美国军舰参与菲律宾海军的联合军事演习和驻扎在菲律宾的基地。美国也在日本的横滨驻扎了“第七舰队”,这支部队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之一,定期在南海巡逻。“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同南海周边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在该地区强化其霸权地位,其南海政策由

“保持中立”调整为“积极关注”,并且在朝着有意干涉他国主权问题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作为“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发展和最终解决将会施加直接的影响。

3.2.4 日本。像美国一样,日本同样被认为是南海“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influenceable SCS stakeholder),因为南海通道是日本经济战略的生命线。日本与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贸易几乎都是通过南海通道来完成的。在南海,日本国家利益与其能源供应的顺畅与否休戚相关。像煤炭、液化天然气一样,日本约3/4的进口石油是从波斯湾途经南海运回日本本土的。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想在南海海洋安全,特别是打击海盗行为、保护航运自由与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虽然日本“和平宪法”对其海外用兵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有事三法案”的通过使得日本在南海安全问题上能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南海区域开发合作对策

“9·11”事件后,由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引发南海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南海的稳定局势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南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妥善地解决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唯有通过双边和区域合作才能遏制和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通常说来,非传统安全是指过去尚未出现的安全现象或近来才凸显的安全问题,它也指除军事,即国家军事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环境安全、航行安全、能源安全、海洋食品安全等^[2]。近期区域开发合作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4.1 实施海岸带的一体化管理

海岸带的一体化管理把社会、经济以及环保问题纳入统筹考虑的范畴,旨在促进海岸区域的可持续发展^[3]。依据世界海岸会议和联合国有关规定,成功实施海岸带一体化管理的标准有:(1)协调和完善立法;(2)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3)拥有较高的公众参与度。作为南海地区居支配地位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中国可继续在制定南海海岸带一体化管理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制定有效的南海海岸带一体化管理政策不但可以减少和限制沿岸国家不断增加的人口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威胁,而且对南海地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南海沿岸国家开展渔业合作的全局均有重大影响^[4]。南海沿岸国家进行合作的具体措施应包括:建立和完善海洋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法律体系,以实现对南海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地区合作框架;加强法律执行机构的建设和执法协作等。

4 2 依托区域合作应对航行安全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猖獗的海盗活动已成为南海海上航行安全的最大威胁。南海地区频发的海盗案件对航运业、保险业、银行业、进出口商以及对海员的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打击海盗行为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包含 2 个方面: (1) 建立打击海盗行为的国际法律框架; (2) 拓展打击海盗的区域或国际合作。打击海盗行为的国际法律框架主要由条约和公约构成,通过这些法律文件确立各有关国家在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各自的责任、义务和集体义务等。

4 3 鼓励与推动能源的共同开发

降低能源安全威胁可供选择的政策之一,就是在南海实现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正在积极探索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可能性^[5]。例如,2005 年,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就解决南海能源开采问题共同采取行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以及越南油气总公司于 2005 年 3 月 14 日在马尼拉签署了《在南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协议三国石油公司确认该协议不损害三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实践各国政府将使南海变为“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地区的承诺。根据该《协议》,协议三国公司在 3 年内联合收集协议区内地震数据,评估有关海域油气资源状况,为未来开展进一步合作做准备。这标志着南海共同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也显示中、菲、越三国的政治互信迈上了新的台阶。

4 4 实行渔业捕捞配额制度

在南海周边国家实行渔业捕捞配额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政策,也是一个将对南海渔业产业发展全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在尚未实行渔业捕捞配额制度的情况下,沿岸每个国家的渔船都会为获取最大份额的渔业资源而展开无序和破坏性的竞争,最终导致南海渔业资源的枯竭^[6]。因此,只有对可捕捞的渔业总量实行切合实际的额度分配,才能对南海的渔业生产进行有效地管理,才能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实行渔业捕捞配额制度还能够促使沿岸各国按配额做好各自的渔业发展规划,包括渔船数量和市场总量等,而且每个国家都将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渔业资源^[7]。通过区域合作不但可以避免经济上的浪费和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最重要的是可以确保南海

沿岸国家拥有可持续的、安全的海洋食品供应。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面前,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指引下,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正在尽力促进南海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这对推进海上共同开发,构筑和谐南海,维护周边稳定,创造双赢或共赢局面,实现南海地区永久和平,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都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Song Yannhuei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w Millennium Before an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EB / OL]. (2006 - 08 - 07) [2008 - 01 - 07]. <http://nl.cycu.edu.tw/newactivity/pdf/03.pdf>
- [2] Dokken Karin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I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Useful Concept? [J]. The Pacific Review, 2001, 14(4): 509 - 530
- [3] Elliot Lorrain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 Pursuing a Non-Traditional Approach [M] / Tan T H, Boutin J D K.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elect Publishing 2001: 438 - 467.
- [4] Nass Tom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orkshop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s Strategic Action Program [J]. The Pacific Review, 2001, 14(4): 553 - 573
- [5] Allen H G. Basic Prerequisites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J]. Energy, 1981, 6(11): 1257 - 1261
- [6] Rosenberg Davi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Developing a Regional Response [J].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999 21(1): 122 - 136
- [7] Wang Kuanhasi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isheries Cooperation as a Re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J]. The Pacific Review, 2001, 14(4): 531 - 551.

(下转第 42 页)

现区域人力资本一体化,把山东省作为一个整体来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

参考文献:

[1] 王建民. 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35- 37

[2] 李玉江. 区域人力资本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121- 123

[3] 孙希华, 李玉江. 山东省人力资本空间结构重心转移与形成机制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4(4): 38- 39

[4] 向志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本投资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12(3): 78- 82

Studies o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Hong-yan, LI Yu-jiang

(College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abundance of human capital represent regional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tic method, the paper summarizes four factors that include economic level, spatial circulation, technical potential and education from 20 ingredients which influenc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Then the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regional difference. The goal is for further inquiring the effective way that reduc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 Such as 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supporting undeveloped region, enhancing the communion and increasing the regional circulation, developing the economy and increasing the human capital demand,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balancing the reg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regional difference; economic level; formation mechanism; Shandong Province

(上接第 29 页)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al Development

WANG Sheng¹, HUANG Dan-ying²

(1 Hainan Foreign Office, Haikou 570204,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emergent maritime security perspectives of the environment, navigation, energy and foo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on-traditional threa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have been noted by scholars since 1980s, but the concept of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region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nly in the new millennium, especially after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principal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threa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arise from (1) marine pollution from littoral states; (2) modern maritime piracy; (3) competing energy security interests; and (4) over-fishing. Op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policy problems through b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recommended for littorals to further enhance environmental, navigational,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